

【打卡一路书香】

出版界的“一人工作室” 为阅读带来多重的光

小型出版机构的成长与其正在散发的光芒。

做的每一本书你都很爱吗

在何大草新书分享会的一周后，记者在光环购物公园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里“逮”到了正在这里工作的任绪军。

“来！我请你喝照母山片区最好喝的咖啡。”

“去你工作室看看吧。”记者提了个要求。殊不知任绪军有些害羞地说：“这里就是我的工作室。”一杯美式咖啡、一台笔记本电脑，人在哪里，办公室就在哪里。

每天去附近的咖啡馆办公，他已经习惯这里的白噪音，这让他产生一种与附近连接的切实感受，同时又让他更加专注地工作。当然，“游击队”的状态也更利于他不间断地奔波于各个城市，与作者、出版社、营销渠道洽谈。

2023年是任绪军从事出版的第8年。8年前，他研究生尚未毕业便去到重庆大学出版社跟随着同事邹荣学习做书，随后，参与创建图书工作室“拜德雅Paideia”。这家工作室专注于人文社科类图书的出版，迄今已出品170余种图书。去年初，邹荣和任绪军获评“单向街书店文学奖·年度编辑”。去年底，任绪军从“拜德雅”离职，开始了新工作室“重光”的运营。

谈及新名字的来历，竟然是单纯地来源于他身边的轨道5号线重光站的站名。如果非要说一下，任绪军说就是“重新的光，多重的光”，与法语单词“relire”（重读）组合在一起就是“一遍又一遍阅读所带来的光，每一次重新阅读都带来不一样的光”。

从业这些年，任绪军始终保持着对做书的热情。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书，以热情为驱动去挑选选题。不到一年，“重光”已经出版了远子的小说集《光从哪里来》、汪民安的思想访谈与随笔集《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》、何大草的中篇小说集《夜行者：从荆轲到铸剑》。

“做的每一本书你都很爱吗？”记者问。

“至少从‘重光’的第一本书开始，希望是这样！”任绪军审慎地回答。不可否认，每一本书都是他的兴趣所在，做书是对他自己的重新塑造，也拓宽了他的眼界，“探索这个世界的人口和出口”，这是他做书的意义所在。

我们不妨透过任绪军这位编辑的“一人工作室”，来看看本土

10月26日，在解放碑刀锋书酒馆举行的“何大草《夜行者：从荆轲到铸剑》新书分享会”上，编辑任绪军的名字被作者频频提起，是他促成了作家何大草的这本中篇小说集的出版。这本书，也正是任绪军在重庆所开设的图书工作室“重光”（以下简称重光）出品的第三本书，而这家工作室还不满周岁。

优秀的纸质书籍承载着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，这是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所不能及的。近年来，小型出版机构在国内的发展呈现出积极态势。尽管规模较小，资源有限，但它们通过独特的选题策划和高质量的出版物，逐渐在出版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，也为出版行业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，推动着整个出版行业的创新发展。

我们不妨透过任绪军这位编辑的“一人工作室”，来看看本土

小型出版机构如何走下去

什么是小型出版？2010年创办“文钻图书”的独立出版人、作家傅兴文说：“我们相当于作家和出版社之间的桥梁，流程和常规出版无异，独立出版人会尽最大努力把一本书运作好，可以做得很精。”2016年创办“乐府文化”的涂涂坦言，和大出版社相比，独立出版人努力为新的发现找到生存空间，热情与风险并存。

“重光”成立后，在尽可能的范围内，任绪军严格控制成本，他没有办公室，也没有耗费资金为自己添加太多设备，更多的钱被他花在了购买版权和谈合作上。接下来，任绪军打算把更多精力放到线下营销推广活动上。借由线下活动，他觉得可以与更多读者交流，得到他们的反馈。

除了今年已经出版的三本书外，重光接下来的出版计划包括：田嘉伟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书写《今晚出门散心去》；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译者、意大利语文学翻译家陈英的随笔集《工作的女人》；再版德国知名艺术理论家格罗伊斯的两部经典作品《走向公众》和《艺术力》……

目前看来，“重光”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还颇为稳健。对此，任绪军坦言：“一方面我非常感激我所遇到的这些作者，另外我深感‘做书’前提是‘做人’。”

他给自己立了一个硬性的规定：在跟作者、译者、朋友们交流时，不能夸饰，也不能把自己的因素代入过多，不能给他们造成一些虚假的判断。真诚地和他们沟通，哪怕这个选题、这本书谈不成，也希望对方是在冷静考量的情形下做决定，而不是基于一种狂热的状态把书稿交给他。

这也许就是小型出版机构（工作室）的优势所在，能够更好地满足作者、读者的个性化需求，而且因为决策流程相对简单，能够更快速地响应市场变化。

理想中“重光”是什么样子

尽管自己的工作室还不满周岁，但任绪军已经有了逐光的目标，那就是他理想中“重光”未来的样子——成立10年的英国一家名为“陆上行舟”的小型出版机构。

“陆上行舟”的名字来自于赫尔佐格的电影《陆上行舟》。别看这是一家只有10名员工的出版机构，却屡获大奖，尤其在文学出版

领域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：已出版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：S·A·阿列克谢耶维奇（2015）、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（2018）和安妮·埃尔诺（2022）。

“也许是我的经历和它的创始人比较像吧。”任绪军说，雅克·泰斯塔德在创立“陆上行舟”之前，已经在出版业工作了快10年，却始终只是文化行业的边缘人物。2014年，雅克创办“陆上行舟”的第一年，整个出版社的正式员工仅有他一人，他要负责一切工作，正如任绪军现在这样的“一人品牌”。

谈及对未来的期许，任绪军充满信心地说：“我们在哪里工作，我们的工作就在哪里回馈我们。”将每一位作者视为“珍宝”，他始终保持着对出版事业的热爱和敬畏之心。

小型出版机构在国内虽然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，但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不容忽视。我们希望阅读市场上多出现一些像“重光”这样坚持以内容为核心的小型出版机构，为读者提供更多元化的阅读选择，在出版市场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。

延伸>>>

小型出版机构 在中国

近年来，小型出版机构在中国涌现。虽然出版人面临着相对高昂的创业成本和更大的风险，但仍然出版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。

拜德雅：成立于重庆，内容多涉及不同人文学科领域的理论与思想。出版了福柯、阿甘本、巴迪欧等一系列重要哲学家的著作。

乐府文化：挖掘出“高龄”作家杨本芬，并出版了她的畅销书《秋园》。目前已出版了超过100本书，并成功实现盈利。

纸上造物：一家单人出版品牌，每年出版一到两本精美质感的大师“小书”。

行思：由资深出版人杨全强创立，出版了拉美重要的后现代小说《三只忧伤的老虎》和詹姆斯·伍德文集。

明室：国内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出版机构，出版了一系列女性主义文本，包括广受好评的《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》，还有一些被遗忘的经典诗歌、小说作品。

发自肺腑的文字 ——读黎延奎随笔集《黎历在目》

■许大立

生。
且看这位资深新闻人的作为：

大学尚未毕业，为了寻找与众不同的新闻题材，他单枪匹马乘汽车坐火车辗转两天时间，去到当时万县地区最偏远落后的城口县挖掘新闻题材，深入基层写了12篇报道，竟被报社全部采用。可以说这是他事业的第一次“爆发”，也在当时的万县新闻界获得较好的反响。

1999年，他第一次去了当时寂寂无闻的巫山县下庄村，提着胆子走了那条曾夺去多人生命的悬崖“大路”。还专门去了另一条更险的羊肠小道，拍下了下庄村最初面貌，把下庄当时的贫穷和苦难，用最真实的镜头展现给了世人，从而引发了社会的更多关注。书中有个细节惊心动魄：村民黄会元前一天还在筑路工地上和他谈笑风生，把他黄会元对生死的坦然摄入镜头。可第二天黄会元就在同一地点被巨石砸入崖底。文章中的那一幕，令人窒息、令人悲伤、更令人痛不欲生。那一年，他撰写的《难忘是下庄》，斩获了四个全国和省级好稿一等奖。

他自告奋勇去到世人都避之不及的麻风病村采访，写了《守望麻风村》一文，把麻风病人的苦难生活告知社会，把转业军人在麻风村的无私奉献展现荧屏，从而引发了社会对麻风病人和麻风病村的关注，也为麻风病的根治以及麻风病人重返社会作出了贡献。

《黎历在目》由两部分构成。第一部分《采访那些事》，写他初涉电视新闻业界的诸多案例与成长历程，写他所经历的重大新闻事件以及感受和感悟。第二部分《回不去的从前》则是亲情友情人情与童年记忆。作者是上世纪80年代攻读新闻专业的一代新闻人，也是最早进入广电行业的新生代，把他自己的职业理想融入崇高的精神领域，也就成就了他的事业与人

情，更是浸润在字里行间。令我印象至深的，是写那个经济不发达年代，父亲省吃俭用竟然给他买了一台海鸥牌相机，这是许多家庭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这台相机是父爱的结晶，也为作者今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。

作者在前言中写道：“我不是一个思想者，没有深刻的理论思考，但我是一个记录者，始终扎根在第一线。我力图用我的文字和影像，用白描的手法，为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记忆，给历史一个鲜活的维度。”

《黎历在目》是一本好书，内容丰富，言之有物，语言畅达，十分好读。用当下流行语说，信息量大，没有虚妄，都是干货。

这本书记录了真实的历史，也记录了作者数十年的努力和奋斗。时代历历在目，我们历历在目，这是作者在记者节到来之际献给这个伟大时代最珍贵的礼物。



电子书
有声书
扫码即可
阅读、收听

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

书评投稿邮箱:cqrbdsb@163.com

来源:《重庆日报》



【作品简介】

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(1999—2002)《张居正》，是作家熊召政创作的长篇小说，共有四卷，2002年结集出版发行。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之上，作者又以飘逸的笔致，随处布置点染一些浪漫主义的情节与人物，并用“木兰辞”“水龙吟”“金缕曲”“火凤凰”等词曲，总摄各卷的情调与韵味，使全书平添了一种苍凉悲壮的诗意，这也是《张居正》的显著特色。

题记:宁为循吏，不做清流；工于谋国，拙于谋身。

人是万物之灵，活着之上，还有精神之道，还需价值信仰。“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，这里之所以用“货”，而不是“献”，取交换而舍无偿，表明新时代的精英阶层，也有主体意识，对奉君之事的付出，也要索取回报。

这种回报需求，并不简单指向物质利益，很多时候还在于价值认同。所谓“士志于道”，说的意思正是如此。春秋以降，在政统和道统的历史对决中，多以知识分子被君王无情辜负为结局。比如，当司马迁遇上汉武帝，赤子之心却换来宫刑之痛，令人心悸；而张居正遇上万历皇帝，殚精竭虑，稳定了帝国江山，生前享尽世间权势，死后却迅疾遭受冤屈清算，祸及家人，牵连生，更是令人嘘唏感慨。

专制皇权何以如此刻薄寡恩与残酷？熊召政的长篇小说《张居正》，无疑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，映照出政统和道统之间的复杂关系，引领人们去思考——连张居正这样功勋卓著的改革派，既有儒家精神，又有法家手段，向政统无限倾斜，重用循吏，不用清流，全力以赴为帝王逐梦，为何最终还是逃不脱权力轮回的悲剧，为何只能接受统治者寡恩负义的恶果？

《张居正》是一部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，深得专家推崇，也被读者喜欢。熊召政写作《张居正》的说明，一个作家只有对文学保持虔诚和尊重，才能得到真正的价值回报。

经典的产生过程，往往就是一个动人故事。熊召政以诗名诗，早在1979年，即以抒情诗《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，制止！》名动诗坛。后来，他选择到商海拼搏，颇有所成。多年以后，又毅然决然放弃生意，回归文坛，关门谢客，青灯黄卷，过着苦行僧的生活，十年磨成一剑，写出皇皇四卷本的《张居正》。

为写《张居正》，熊召政查阅史书典籍，搜集文献资料，苦研明史细节，打下文化深井。开启这段写作苦旅，他在文稿扉页上写道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的文学大三峡工程开工！”几天后，他又补上一句：“希望不是豆腐渣工程！”写完第一卷，熊召政把手稿送给不同类型读者，而后根据反馈，判断出这是失败之书。于是，他将第一卷烧了重写。第二卷，烧了一半重写。熊召政上演现代版的“焚玉毁书”，体现的正是作家对价值的坚守。

不过，改革者从来不乏争议，张居正也不例外。比如，钱穆就认为张居正只是个权臣奸相。这部小说也并没有将张居正定格为“高大全”的改革者形象，而是展示了张居正极其复杂的一面，既有城府极深的权谋智慧，也有残酷无情的铁血手腕，还有生活享受的奢侈之风，甚至不乏对情色淫欲的喜爱。

扛着棺材前行，头顶着各种污水，历史上很多改革家难有好下场，这似乎是一种宿命。少年皇帝对手握最大权柄的张居正既敬重又嫉恨，既依赖又忌惮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皇帝尝到权力滋味，更加笃信皇权不能旁落，对张居正的很多决断心里不服，表面言听计从，私怨越发深重。特别是万历帝的种种“恩泽泛滥”劣迹，被发现后，面对张居正写下“罪己诏”的公开羞辱，内心更是深埋了仇恨的种子。张居正病逝之时，万历已经21岁，李太后对其已经无力束缚，这位享受着“万历新政”福惠得以江山稳固的帝王，心中仇恨迅速取代悲伤，在张居正尸骨未寒之时，就迅速展开清算，连下十几道圣旨，新政废除，封赠全夺，家产尽抄，如若不是张居正长子被逼上吊自杀，恐怕张居正也要被挖棺鞭尸，挫骨扬灰。

精于治国，疏于防身；功在社稷，过在身家。曾经救时济世，立下社稷之功，但还是要接受被帝王辜负的悲剧。张居正作为改革家的下场，虽不及商鞅车裂之惨，却又远比王安石放逐更悲。春秋以降，乱崩乐坏，政统奉行法家化的专制暴力，渐然让道统沦陷，士人风骨渐失。到了明代，关乎世道人心的道统更加式微。知识分子出身的张居正，尽管既有儒家权力崇拜的愚忠，也有法家暴力治理的铁腕，做到了符合政统需要的实用主义，然而，在专制皇权的无情践踏之下，只能成为极权统治的一枚棋子。随着张居正新政废除，大明时局急剧败坏，危机迭起，直到天启时张居正才被恢复名誉。最终难以力挽狂澜的大明末代皇帝崇祯，对张居正(生于湖北江陵县，亦称“张江陵”)如此感慨：“抚髀思江陵，而后知得庸相百，不若得救时相一也。”

只可惜，世间再无张居正。“恩怨尽时方论定，封疆危日见才难。”这是张居正故宅里的题诗，是对皇权无情的嘲讽，也是对善待改革家的深情呼唤。只可惜，这样的呐喊之声，往往只能飘荡于历史的空谷之中，不被整个世界听见。正如《张居正》中那位有情有义的玉娘所唱：“皇城中尔虞我诈，衙门内铁马金戈……呜呼！今日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，到明日敗走麦城，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。只可叹，荣辱兴衰转瞬间。”